

澳門路環島九澳村

一條濱海客家村的歷史考察

鄭德華*

澳門路環島九澳村是目前澳門地區僅存的客家村落之一，中以鍾、張、何、吳諸姓居多，是一條雜姓村。這條村大概形成於清代乾隆年間，是清代雍、乾時期粵東北客家人向沿海遷徙的產物。從九澳村發展的歷史來看，遷徙來的客家人之所以能在此凝聚繁衍，其重要因素是：他們使用同樣的客家方言、有共同的神靈崇拜和形成了團結互助的傳統精神。作為一個具有超過兩百年歷史的澳門自然村落，它無疑是客家人從山區遷徙到海濱立足和生存的一個重要案例。

在澳門的歷史研究中，客家人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以致一般人對澳門客家人的歷史都不甚了了，更遑論客家人與澳門歷史發展的關係了。在2005年出版的《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中，作者把客家人看成是一種由少數民族混合而成的方言群，且把它放在“澳門原住民”的條目之下：“僑、畚、蟹三族應該為澳門地區最原始的居民。僑、畚、蟹三族同源客家，因此，客家文化是澳門歷史文化的起始成份。”⁽¹⁾在該條目中，有一句是涉及九澳村的人口歷史的：“其早期村民為客籍。”⁽²⁾因本文不是討論客家方言群起源的文章，也不打算全面研究澳門地區客家人的來源問題，祇是就九澳村客家人的歷史作初步探討，屬於個案研究，故不打算詳細分析這些近期發表的有關澳門客家問題的言論，但對涉本文研究內容的個別論點，則會清楚地闡明作者的看法。

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九澳村客家人發展的歷史主線以及他們凝聚的方式。由於澳門現存有關九澳村

的文獻資料甚少，故本文所用資料除歷史文獻、歷史地圖等外，很多是實地訪問、調查的資料，希望透過這些資料的分析，重構這條濱海客家村的歷史。

從山區到海濱： 清代廣東客家人遷移的路線之一

筆者一向認為，客家人是歷史上北方漢族南遷過程中，不斷融入沿途地方的血統（包括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最後在粵、閩、贛三省交界處形成具有獨特方言和習俗的方言群體。客家人在形成方言群後，無疑仍然屬於漢族的範疇，所以在學術界客家方言一向被認為是漢族方言的一種。明清時期，粵、閩、贛三省交界的客家人開始不斷向外擴散，其中粵東的一支向西南方向遷移，沿今河源、紫金、惠州進而到達中山、珠海、新安一帶。⁽³⁾

客家人遷移到海濱的重要原因，與雍正年間清政府的鼓勵直接相關。康熙年間，東南沿海地區的

* 鄭德華，香港大學博士，主修歷史，研究、教學領域包括中國通史、中國近現代史、嶺南地域文化史、客家歷史文化、港澳史、東南亞近代史、僑鄉及海外華人史等。主要著作包括：《歷史追索與方法探求》、《廣東僑鄉中西合璧建築》、〈馬尼拉的巴利昂華人社區（1582-1860）〉、〈客家歷史文化的承傳方式——客家人來自中原說試析〉、〈“一口通商”與“澳門航道”〉等。現任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美國三藩市州立大學校外兼職教授、廣東社會科學院孫中山研究所與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廣東華僑歷史學會顧問。

遷海運動使廣東沿海地區的人口數量急遽下降，雍正年間清政府頒佈的墾荒優惠政策，就是為了解決沿海人口不足的問題。

雍正十年(1732)，廣東巡撫鄂爾達在委派陶正中勘查廣東中、西路土地的基礎上，提出業戶招佃承墾的辦法來推動沿海墾荒計劃的實行：

……因該處地廣人稀，雖有藩庫墾荒銀兩，莫肯赴領承墾。臣等諭令有力商民召集惠、潮等處貧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即給地百畝。復念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

仍恐日後予奪憑由業戶，不能相安，應為從長計議。凡業戶領田百畝，各佃俱帶領地五畝，與田主一例納糧，永為該佃世業，田主不得過問。(4)

適逢此時粵東的客家地區人口與耕地資源的比例已經失調，存在人口過剩的社會問題。於是，客家地區部分人口在政府鼓勵墾荒政策的推動下，向廣東中路及沿海一帶流動。相信早期遷入九澳村的客家人，就是屬於粵東向西南方向遷移的客籍移民的後代。關於這個推斷，從九澳村張氏和鍾氏族譜均可以得到證明。

《張氏族譜》之一螺旋形詩環繞中央“福昌”二字順時針由內向外旋出的四言詩順排如下：

永振家聲 倫發南洋 義支并茂
氣運中山 奧連紫金 隆盛河新
惠志太平 傳我宗族 奕世其昌
安守全志 洪忍可勝 轉達明源

在螺旋詩的兩旁有聯句：

永源轉倫從頭起
後代宗枝順行流

詩中提到，張氏家族在廣東中山、紫金、河源、新安(深圳)、惠州、太平(東莞)等地均有落籍繁衍，還有部分到東南亞謀生。而與本研究有關的就是明確指出張氏家族一支到了中山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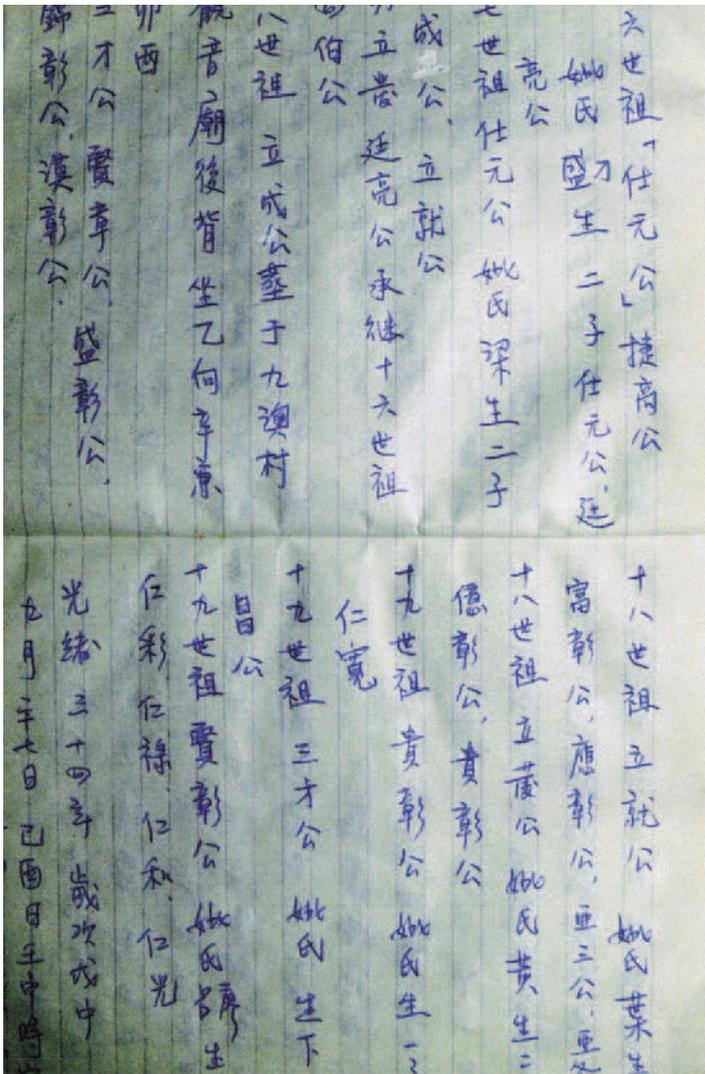
《張氏核譜》之二為族系資料：

張氏二十一世祖——

張雲三……，葬於惠州紅田尾。夫人劉氏，生五子，葬於九澳村。



【圖1】張氏族譜的螺旋形詩



【圖2】鍾氏族譜

張氏二十二世祖——

張廷湘（張雲三兒子），生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葬於九澳村。

張廷海（張雲三兒子），生於嘉慶三年（1798），卒於同治元年（1862），葬於九澳村。⁽⁵⁾

張氏的族系資料說明：第一，他們的先人在二十一世，即祖先張雲山的時期開始遷到九澳，

而在二十二世祖時，開始定居於斯。雖然張雲山本人不葬在九澳（按：許多宗族的歷史都顯示，第一代移民有回原居地安葬的習俗），但夫人劉氏卻已葬在九澳，而他的兒子張廷湘、張廷海均葬於九澳。第二，張氏的二十二世生活於乾隆晚期到同治年間。即從18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60-70年代。由此推算，張氏先人大概應是在乾隆中後期遷到九澳村的。

《鍾氏族譜》所載族系資料：

鍾氏約在宋哲宗時代（1086-1098）從江西、福建一帶入遷廣東，到長樂縣（今五華）、歸善縣（今惠州）、龍川縣、河源縣、東莞縣等開基立業。

來廣東後的其中一支，在第十五代程理公時入遷香山縣下恭園。

來廣東後的第十八代立成公葬於九澳村。

來廣東後的第十九代賢彰公於光緒十四年安葬。⁽⁶⁾

《鍾氏族譜》的資料說明目前居住在九澳村的鍾氏家族，其先人自宋代以來活躍在江西、福建和廣東三省之間，是典型的客家人。後來其中一支首先在

粵東立基，然後再度向西南方向移動到了香山縣。雖然《鍾氏族譜》在年代的紀錄方面欠詳，但按他們入粵後的第十八代已生活在九澳、十九代死於光緒年間，大概可推算鍾氏最遲在嘉慶至道光年間，已經來到九澳。

當然，目前所能看到的有關九澳村的家族資料不算太充份，但如果參照鄰近地區，如中山、珠海、深圳、香港等客家族譜資料，便可清晰地看到清代客家人的遷移路線，他們部分從閩贛粵三省交界的山區逐步向平原和海濱遷徙。



48 香山縣圖

【圖3】清《香山縣志》中的九澳



【圖4】民國《香山縣志續編》中的九澳

九澳與九澳村

澳門地區路環島，在歷史上曾屬香山下恭鎮管轄。據有關澳門、香山的歷史地圖資料，“九澳”地名的出現，比“路環”早，約在清嘉慶到同治年間已經非常明顯地出現在地圖上。⁽⁷⁾而到1923年厲式金編修的《香山縣志續編》，在下恭鎮屬下的路環島圖，仍祇有“九澳”一個地名，可見九澳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⁸⁾結合上文提及的有關族譜資料，我們有理由相信，九澳起碼在清中葉，已經有人在這個地方活動並引起清朝政府的關注。雖然我們不敢武斷地把歷史上的“九澳”等同於今天的九澳村，但歷史地圖所標的九澳方位與九澳村完全相同，均位於路環島的中部偏北的一個小山溝。

九澳村是一條雜姓村，目前以姓鍾、張、何、吳較多，全部自我界定為客家人。全村人口約二百，但常住人口不到四十人，年齡平均超過六十歲。他們的耕地大部分已經出賣，但除了早已建成的發電廠和水泥廠外，新的土地主人對原農耕土地並未大量開發利用，所以基本上仍保持着自然村落的形態，是澳門地區僅存的郊野村落之一。我們把從村中訪問調查所得的口述資料和文字資料互相印證，加以分析整理，將這條小村的歷史發展線索簡括如下——

清代乾隆年間，一些來自香山縣的客籍人開始在九澳一帶活動。他們的先民雖然並不是漁民，而是習慣於山區耕種的農民，但由於向香山一帶遷徙的過程中，逐步學會適應濱海的生活。所以，當他們到九澳後，最初在九澳灣（現九澳水泥廠位置）一個非常原始的海灣從事捕魚、煮鹽維生，後來逐步遷往



【圖 5】三聖廟碑記



【圖 7】張姓家族墓碑

現在的村址，回復客家人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形態。他們最初租地耕種，土地屬於香山沙尾鄉（現珠海

灣仔後背南屏鎮）人所有，後因地主覺得土地離他們居住的地方太遠管理不便，逐步把土地轉賣給在九澳村落籍的客家人，於是他們便成為這裡的原住民。⁽⁹⁾



【圖 6】九澳村墓地

在清代中後期，在九澳村的西面亦逐步形成另一條客家村落，名叫“黑沙村”。⁽¹⁰⁾這兩條村與當時島上與外界聯絡的唯一渡船碼頭距離較遠，所以都沒有發展為商業與居住結合的一個墟鎮的民居點，而是發展為以農業為主的村落形態，而它們之間的聯繫，因語言的溝通方便逐步加強，成為一種海島型的客家聚落。九澳和黑沙村是澳門地區目前僅存的客家村。



【圖 10】觀音廟內的觀音神像



【圖 8】觀音廟



【圖 9】觀音廟正門廟名橫匾



【圖 11】觀音廟牆上的裝飾圖畫



【圖 12】觀音廟牆上的裝飾圖畫



【圖 13】三聖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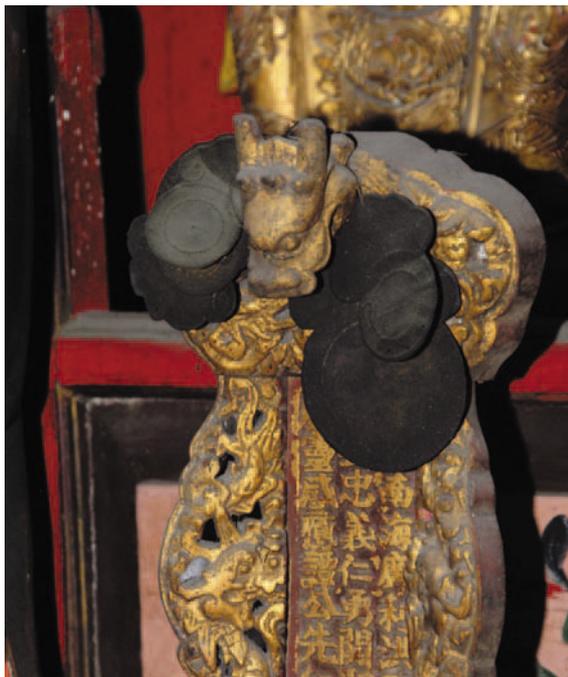
【圖 14】三聖廟神壇上的神像



【圖 15】光緒年間三聖廟的正門題匾

九澳村人到路環後移動的歷史痕跡，可以從廟宇的遷徙得到證實。現座落於海邊的三聖廟，是於光緒九年（1883）新建的廟址。⁽¹¹⁾

茲我九澳灣，有洪聖神也，由來古矣。迨至同治初年，人倡建增，勸捐重修，迄今多歷年所。⁽¹²⁾



【圖 16】三聖廟神壇上的三聖牌匾

從碑文可見，此廟在最初供奉的是海神廣利王洪聖。而據當地流傳的口述歷史，在九澳灣時廟稱

“大王廟”，“三聖公廟”是遷到現址後所改名稱。⁽¹³⁾



【圖 17】九澳村大伯公神壇



【圖 18】九澳村的土地廟



【圖 19】九澳村的海神神壇



【圖 20】互助會部分女會員在村公所前合照留念（1991）

目前這座面臨大海的神廟，鄰近仍可見有幾間半荒廢的舊房屋和少量菜田，但祇有一人居住，並與現在九澳村人口密集的地方有一段距離，說明這部分地方已被逐步荒廢。

現九澳村人均聲稱擁有道光年間的買地地契，可見這裡一向屬清朝管轄，但從 19 世紀 60 年代開始，澳葡政府已經在路環開始實行行政管理，並徵收地稅。⁽¹⁴⁾ 在 1887 年的《中葡條約》簽訂後，路環完全被葡人納入控制的範圍，在九澳一帶建麻瘋院、兵營、學校和教堂，開始了九澳村的現代轉變。

20 世紀初，是九澳地區發展的重要時期。1912 年，澳葡政府在這裡建築一個兵營，隨着這一設施的設立，許多配套的設施亦接踵而來，如興建馬路、水渠、郵局、學校。⁽¹⁵⁾ 但這些轉變，對九澳無疑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不是根本性的影響，因為澳葡政府在這裡增設的祇是一些非民用的東西，因而並沒有刺激當地的生產和商業經濟的發展，也沒有

改變九澳村作為客家村的特色，這裡的主要人口（按：指男性人口）仍然是客家人，農業仍然是他們維持生計的主要手段。

九澳村客家人凝聚與發展方式

前面曾經提及，從可考的資料說明，九澳村建村至今約有兩百多年歷史。這條村落最大的特點是一直保持客家村的特色。它與鄰近地區所使用的方言完全不一樣，生活的傳統習慣也有較大差別，可以說它是一個由各種歷史偶然因素集合而成的方言孤島。⁽¹⁶⁾ 由於本文研究的重心是這條客家村落的發展歷史，而不是做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所以對有關九澳村客家話的源流和變異不作具體論述。

中國人口遷移的歷史反復告訴人們，人口自然凝聚的因素主要是血緣、地緣和方言，而三種主要因素往往會因具體歷史環境而有所偏重。

從九澳村的歷史發展來看，這條村凝聚的最重要因素是方言。

理由之一是九澳村一向沒有建祠堂。這一點非常特別。從客家發展歷史考察，我們發現這個方言群比較重視傳統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方面，自宋代以來，所有中國基層社會對宗族的三大支柱族譜、族田和祠堂都十分重視。祠堂是宗族存在的標誌，所以各族建有自己的祠堂，這似乎已成基層農村的定例。但九澳村的情況比較特殊，在20世紀以前，這裡交通相當閉塞，對外聯絡相當不便，另外加上在孤懸的島上，常遭海盜侵擾，鄰里互助顯得格外重要。如果強調血緣，勢必各立門戶，使人口本來不多的村落四分五裂，絕對不利於生存。

理由之二是，他們比較重視客家方言的傳遞。從二百多年前建村到20世紀70-80年代，九澳村一直保留客家方言的使用，嫁到這裡的婦女都學會客家話。“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條客家人的祖訓在九澳村實行得很好。

正是因為實行以方言為凝聚的主要媒介，所以營造出來的九澳村是一個雜姓的客家村，睦鄰是村民生存的一項重要原則。

以方言為凝聚力的客家村，雖然沒有依靠宗族勢力作為支柱，卻完全可以維繫血緣紐帶的存在。透過方言保持甚至加強血緣關係這一種理論，在九澳村的歷史發展中得到充份的證明。直至今日，村中各姓氏家族對本族、本房的世系仍然十分清楚，不少族姓都保留有自己的家族傳統，如實行按字排輩代代相傳。村內每個家庭都安有祖宗神位，慎宗追遠的觀念仍然牢固。而九澳村的墓地，雖然經過數次遷徙，而先人的墓葬仍然可以上溯到晚清時期。⁽¹⁷⁾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語言和宗族文化相互依存的關係。無論哪種方言，它們總是和某種文化相結合。語言帶着文化走的規律是使客家人始終沒有脫離自身原有文化的根本原因。居留地的轉移，並沒有使客家人群體失去它的凝聚力。

九澳村人能凝聚的另一最重要因素是有共同的神靈崇拜。



【圖 21-24】九澳村現在尚保留農村聚落形態



【圖 25】九澳村村民過去舂米用的石臼

在九澳村，家庭內崇拜的神靈包括：祖先、土地、天官、觀音、關帝等；而在村裡則有一座觀音廟⁽¹⁸⁾和一座三聖廟⁽¹⁹⁾，還有一座伯公神壇⁽²⁰⁾，一座土地廟⁽²¹⁾，一座海神神壇⁽²²⁾。

觀音廟和三聖廟是村中的大廟，在澳門地區亦稍有名氣。觀音是客家地區崇拜的重要神靈，作為客家村，有一座觀音廟是順理成章之事。三聖廟供奉洪聖、關公和譚公。洪聖是海神，在明代以前是南海最高的神靈，後來雖然逐步被天后取代其首席海神的地位，但仍屬重要的神靈。關公作為正義、

正氣的社會象徵，作為鎮邪驅妖的神，對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士來說特別重要。譚公則是流傳於惠州客家地區的神，拜譚公實際是表現了他們在宗教信仰上的客家人特性。⁽²³⁾從光緒九年的〈新建九澳灣三聖公廟碑序〉後面所列的善信捐工金銀芳名中可以看出，當時崇拜三聖廟善信不少，特別應注意的是，芳名中有相當多的商鋪名號，說明這座廟宇的威名遠播，在澳門地區的神靈中屬威望較高的一個。我們都十分清楚，在光緒年間從澳門半島或香山到路環的交通十分不便，水路是唯一通道，所以更顯得三聖廟神靈具有不一般的吸引力。在中國古代，一個地方神靈的威望，實際上就是某一地方的威望。相信當年三聖廟的威望成為九澳村人的驕傲，這種精神上的滿足使九澳村人的凝聚力更加鞏固。

在九澳村流傳着一個有關伯公神的傳說：一次，因要做慶觀音誕的法事，請來一位道士。這位道士看到村裡一切正常，想作法擾亂這裡的正氣，使九澳村人要常常請他來作法，以便他從中圖利。可是正當他想施法時，卻看見一位高大威風的伯公對着他怒目而視，令他大吃一驚，立即停

止作法的歹念，並到處對同行說，九澳村的伯公真厲害，切不可到那裡造次。

另一個是關於三聖公顯靈的故事。九澳位於十字門要衝，在 19 世紀是海上商旅的重要通道，亦是海盜活動猖獗的地方。當年的海盜不僅打劫商船，還常到岸上搶劫。有一次一群海盜駕船到九澳村企圖搶劫，忽然見到村內旌旗飄揚，一隊隊兵將鐵盔鐵甲裝備精良，嚴陣以待，祇好慌忙逃遁。

我們從流傳於九澳村有關伯公、三聖公顯靈的故事可見，村民們之所以構想出一種超現實的神靈



【圖 26】不少九澳村人家中仍存有男丁結婚時賜名的紅牌匾

力量，無非是為了保護他們地方安寧，使九澳村成為他們世代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這裡的客家人，正是從神靈的崇拜中獲取生存於這塊土地上的理由，從而產生一種樂意生於斯長於斯的歸宿感，這種對神靈的崇拜，實際上已變成一種巨大的凝聚力。

九澳村的凝聚力，亦來自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團結互助精神。

由於九澳村的形成不是由某一個姓氏的移居、繁衍發展而來，而是由不同姓氏的共同開發而逐步建立，所以團結互助精神便成為這條村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他們不僅通過使用共同的方言達到凝聚的目的，更因生活在共同的習俗文化中融為一體。村中的老一輩人家可以非常生動地敘述這條村子在春節、寒食、清明、盂蘭、中秋、重陽、冬至、除夕等節日的活動，以及他們所共同愛好的客家飲食文化，如何使他們的祖先樂於生活於此。⁽²⁴⁾ 由此可見，相同的文化習俗和心理，就是九澳村人能夠凝聚的另外一種力量。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和考察，更會發現，這種相同文化群體的結合，在有外部壓力的環境中，不僅能夠產生獨立的村落形態，而且會形成特別團結的氛圍。正如前文所述，客家人是在清代才逐步向廣東沿海擴散的，他們往

往以方言孤島的形態存在。這種存在的形式決定他們必定會承受一定的外部壓力。在清乾隆年間形成的九澳村就是其中典型例子。這條村地處邊遠海島，交通不便，加上附近一帶都是廣府方言群活動的區域，種種社會的因素都要求村落內部非常團結，才能生存下來。九澳村就是在內部具有客家人共同的方言和文化習俗、外部生活條件刻苦、並不能一下子融入地方文化圈子的雙重因素作用下，產生一種非常突出的團結精神，而這種團結精神，正是使這條客家村落能夠凝聚和不斷延續不可卻缺少的的原因。

當我們考察九澳村客家人團結精神的原因和表現時，發現互助是他們促進團結的重要方法。我們知道，互助是人類在向自然和社會生活鬥爭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現象，也是克服困難的重要武器。客家人在不斷的擴散過程中，形成了一些與其它方言不同的特性，其中對群體內部的互助特別重視，尤其在孤島型的方言聚落中更是如此。九澳村為瞭解客家人這方面的特性，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當筆者在作口述歷史調查時，所得的資料都顯示，互相幫助是九澳村突出的文化傳統。無論過去或今天，無論是在生產和生活上，如果一家有困難，其他家

庭都樂意提供幫助。特別是於1991年成立的村組織，就叫“九澳村民互助會”，充份表現了這種互助文化傳統的重要影響。⁽²⁵⁾

九澳村歷史的研究價值和存在問題

九澳村研究價值在於：1) 由山區和半山區遷到海濱的客家人，他們仍然以方言群的形式存在，但在社會的形態上，如對宗族活動的模式卻有所改變。2) 客家人一方面善於利用自然條件進行生產活動，但又往往不忘山區和半山區農業生產的經驗，使新開拓的地方很快能從事農業生產，這對沿海地區生產多元化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3) 客家人善於調和處理方言群內部的各種關係，使社群和睦相處。4) 客家是澳門地區清代以後入遷較早的居民之一，他們帶來的耕讀文化，對沿海地區無疑存在一定的影響。

從20世紀60年代起，由於九澳村與外界交通的改善，封閉的村落形態迅速改變，到了21世紀，九澳村正面臨一個重大的改變，它們可能永遠告別過去的村落形態。伴隨時代的前進，傳統村落的消失固然不可避免，但作為澳門稀有的客家村落，是否應該把它作為典型的地區歷史，如氹仔舊市區那樣保留下來？這很值得澳門人推敲、研究。⁽²⁶⁾

筆者認為，近年澳門特區政府在城區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方面成績令人矚目，如果能在郊野村落的歷史文化方面再加努力，使澳門成為一個既有城市都會歷史文化，又有郊野村落歷史文化的文化之城，豈不是錦上添花更令人嚮往？

【註】

- (1)(2) 參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2005年4月，頁490；頁16。
- (3) 有關明清時期廣東客家人的遷移原因和路線問題，參看拙作：〈晚清以來客家研究述評〉，載《中文集刊》第二卷(1986-1988)，95-123頁和本人在香港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廣東中路土客大械鬥研究〉(1856-1867)，第二章：“廣東中路的‘土’與‘客’”。

- (4) 鄂爾達：〈按察粵東窮民疏〉，見仁和琴川居士編輯：《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0月，頁2565-2567。
- (5) 參看《張氏族譜》，手抄本，藏九澳村，見【圖1】。
- (6) 《鍾氏族譜》，手抄本，藏九澳村。見【圖2】。
- (7) 參看嘉慶和同治繪製的〈香山縣圖〉，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1月版，頁79。見【圖3】
- (8) 厲式金修、汪文炳等纂：《香山縣志續編》，卷一“圖”，1923年版。見【圖4】
- (9) 口述資料的訪問者：張國財、鄧觀愛、鍾容根、張嬌等；時間：2005年10-12月；地點：澳門路環九澳村。
- (10) 這條村是澳門地區另一條客家村落，與九澳村有相似的歷史發展過程。有關這條客家村的歷史情況，容另文撰述。
- (11) 此廟按老一輩的村民說，原址在現廟址的小山丘之背，即在名為九澳灣的地方，亦即他們開村先人最初到九澳落腳的地方。
- (12) 見【圖5】。參看〈新建九澳灣三聖公廟碑序〉，見鄭煒明編：《葡佔氹仔路環碑銘楹匾匯編》，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7月版，頁92-97。
- (13) 資料來源同註(9)。從廟宇名稱的改變，可以看到九澳村民的神靈崇拜既包含了客家人信仰傳統的繼承，又顯示了他們的信仰文化隨着時代和遷移地方的變化有所改變。
- (14)(15) 參看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Município das Ilhas*, Vol.1, 1993, pp. 20-53; pp. 152-190.
- (16) 有關客家方言孤島的論述，參看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頁33-35。
- (17) 參看【圖6、7】。
- (18) 參看【圖8、9、10、11、12】。
- (19) 參看【圖13、14、15、16】。
- (20) 參看【圖17】。
- (21) 參看【圖18】。
- (22) 參看【圖19】。
- (23) 據考譚原名譚峭，元代廣東歸善(今惠州)人，十二歲就得道，練成長生不老之術，並能預測天氣，治病救人。他經常幫助、保護惠東一帶的漁船和商船，故被當地人供奉為神靈，是客家人崇拜的神靈之一。參看魯金：《香港廟趣》，次文化堂，1992年版，頁10-11。
- (24) 據現在九澳村內老人的回憶，這條村最受歡迎的節日食品是用裝糖的大瓦缸去煮的客家盤菜、年飯、葛扣肉等。
- (25) 同(註9)，參看【圖20】。
- (26) 有關九澳村現存的村落現狀和保留的傳統文化，參看【圖21-26】。